

# 以房养老,不意味着淡化政府责任

□京文

近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其中有关“以房养老”内容,引发舆论关注。发展养老服务就是只发展以房养老吗?政府对发展养老服务不管了吗?对此,民政部有关负责人回应,以房养老只是养老政策的一个项目,养老服务是重大民生问题,政府是保障基本养老的主导力量。

之前一些对于以房养老政策的误解,让公众吃了一颗定心丸。

其实,公众的担忧是不必要的,以房养老由于存在一定门槛,加之民众接受需要一个过程,所以短时间内很难大面积推广开来。而且,即便这个模式成功运作,它也不可能取代政府养老责任,养老作为政府主导的基本公共服务,这是全世界通行的准则。

事实上,政府在养老上的责任,目前不仅不能淡化,更要进一步强化。

一方面,这是因为中国面临的人口老龄化压力越来越大,“十二

五”时期,中国将出现第一个老年人口增长高峰,60岁以上老年人将由1.78亿增加到2.21亿,老年人口比重将由13.3%迅速增加到16%。与此同时,我们在养老服务方面的准备却非常不足,在许多养老机构床位一床难求,专业的老人护理人员极其匮乏。

另一方面,这些年来对于养老投入虽然不断增加,但尚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最近新华社就报道,在许多地方,新农保原地踏步成“鸡肋”,原因就在于,新农保每月55元基础养老金,根本不足以支撑农民的基本生活需求。据统计,城镇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经过8年连续上调之后,2012年月人均养老金达到1721元,超过目前农村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的31倍。城乡养老之间的巨大差距,需要加大投入去弥补。

此外,民众的养老负担依然较重。媒体曾报道,相比国家的保障责任,个人和工作单位在社保缴费中的责任和压力过大。中国社保缴费率为全球最高,约为“金砖四国”其他三国平均水平的2倍,是北欧五国的3倍。与此同时,企业的养老金要远低于事业单位人员和公务员。所以,我们迫切需要民众的

养老缴费负担降下来,把普通民众的养老待遇提上去,这些都需要政府责任的“加码”。

一些民众误读以房养老,固然应澄清,但从这一现象中,我们也应看到民众对于未来养老的焦虑与担忧,看到相对于目前的老龄化速度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财政对养老投入力度仍需加大。简政放权,激发社会活力,发展养老服务业,是件好事,但养老的形式和渠道再怎么变,政府的责任也不能有丝毫缩减,相反,这理应是加大政府投入与保障责任的契机所在。

民政部门的回应,无疑澄清了

## 网言个论

### 该找“谈心哥”好好谈下心

□洪信良

福建日报报道,有人向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督导组汇报成果,说本单位有一领导10年来找部下谈心多达3268次。督导组的人反问道:“这个数字是怎么统计出来的?”汇报者一脸尴尬,半天说不清楚。

有好事者粗略一算,一年52周,104天左右公休,10天国定节日,工作日总共252天左右,大致算下来,10年里工作日一天谈心一个不够,大概得分单双日才行,单日谈一个,双日常常得谈两个。这可真是位勤勉自励、每日不忘联系部下的领导啊,只是“3268次”谈心的纪录不知是谁做的,该不会是该领导亲自动手,每跟部下谈一次心,就奖给自己一朵小红花,最后数这一大堆小红花得出的精确结论吧。

谈心有两个意思,一是谈心里话,如促膝谈心;二是闲谈,如对酌谈心。在督导汇报的语境下,所谓“谈心”肯定不是指闲谈唠嗑,而是指目的明确的、带着工作任务的与部下的坦诚交流。不知这位领导的直属部下有几位,假定只有十位,在车轮战式的“谈心”工作中,每位部下平均跟他谈了一年的心。不管这谈心是听取部下意见还是做部下的思想工作,在这样的持久战中,照

理双方的思想与感情都早已“赤裸裸”的了,却还要乐此不疲地反复谈,到底谈出啥来了?

还别说,这谈心还是有“效果”的,不是有人在向督导组汇报时讲了他的“成果”了吗?这成果虽然是如此经不住推敲,但汇报者美化领导的意图还是昭然若揭的。看这“心”谈的,都“偏”了。估计这位汇报者是不敢自作主张,编出3268次谈心来的,但他甘心做传声筒,想必跟那位领导处得不错。十年谈心,谈出的却是一片私心。

而更让人惊心的,则是“假大空”到不自知的“欺心”。可以肯定,“谈心哥”标榜自己3268次谈心绝不是为了黑自己,那位汇报者替他呈报谈心“成果”也不是想当高级黑,那么,他们面对督导组,为何还敢拿出明显造假的谈心“成果”呢?是他们数字浮夸风的惯性使然?是他们评判督导组的担当使然?我想两者应该兼而有之。“谈心哥”这一次的政绩展示,恰恰反证了他不正不实的一面,想必也交流过“官员出数字,数字出官员”的经验与心得。

可以说,“谈心哥”的3268次谈心,暴露了某些官员说谎不眨眼的丑恶作风,有的官员甚至达到了假话说多了连自个都当真的高“境界”。群众路线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为了打击、转变假大空的作风,督导组、纪委都该找“谈心哥”好好谈一下心了。

## 百姓说话

### 下架月饼去向不能全凭商家良心

□王军荣

过了中秋日,月饼就从金贵变得无人问津了。记者在各大超市看到,如298元的盒装月饼,现价25元。中秋盒装月饼大多1-3折甩卖,上演最后的疯狂。但如此疯狂的促销也难保月饼被市场完全消化,那些剩下的月饼,流向何方一直是大家想弄清楚的。业内人士称,对此目前并无有效监管,下架月饼最终去向全凭商家的良心。(《重庆商报》9月20日)

中秋一过,月饼的价格大跌,月饼也要随之下架。然而,下架月饼的去向,却一向是个谜。虽然经了解,一般情况下,下架月饼会有四大去处:低价销售、员工内部解决、出售给糕点店,而过了保质期的月饼则会集中销毁。然而,消费者最担心的是集中销毁这种方式。谁能保证百分百销毁?想必,南京的冠生园月饼陈馅事件是不会被轻易忘记的。

诚然,商家也知道月饼的“存活期”很短,他们会根据市场预测生产,但市场的变化常常是很难预测的,今年许多单位不发月饼,这会大大减少月饼的需求量,也会使

月饼的存货量增多,这些月饼的去向很需要让公众明明白白,大家最担心的是,过期的月饼或馅料又会改头换面混入市场。

下架月饼的去向,需要有一本明白账。这“账”显然需要监管部门去做。其实,在销毁月饼方面,也已有相关的规定。对回收产品,厂家须做详细记录,包括回收原因,回收数目以及回收后的处理方式等,“如果进行了销毁,还需登记见证人姓名。”可规定是一回事,能否执行却是另外一回事,而这样的规定,如果全凭商家的良心,是不可靠的,有时,商家的良心根本就禁不起利益的诱惑。

月饼下架,需要监督“紧盯”。要主动出击,而不是坐视不管,更不能凭商家自行操作。月饼去向这本“账”如何做?这关系到消费者的健康。一方面,在月饼下架之后,监督就对厂家的月饼去向进行紧盯。看看剩剩多少,又是如何处理的。其处理方式需要及时向公众“汇报”。让公众清清楚楚;另一方面商家也需要一些激励措施。毕竟集中销毁,就等于增加了成本。虽然这是应该做的。

若对月饼的监管每年一年都全靠商家良心,我们在中秋,就有可能吃到一年前的月饼,如此,我们还能好好地欣赏月亮吗?

## 画里有话



朱慧卿/图

### “半仙”党员

□徐大发

浙江浦江县城坛镇薛下庄村党员薛某,长期摆摊算命,外界号称“薛半仙”。在今年4月开展的党员民主测评中,“薛半仙”被镇党委清退出党。全县和他一样被劝退或除名的不合格党员共有55名。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居然失去了应有的信仰,沦落到街头摆摊算命宣扬封建迷信的程度,他的被清退确实很有必要。浦江县委根据《党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

法规文件,对不合格党员予以劝退或除名,确实起到了纯洁党员队伍,巩固堡垒的作用,值得推广。

但我们又不能止于清退,要多反思我们的党员纳新程序和党员教育活动是否扎实有效。某种程度上,是我们对入党积极分子审查把关不严以及对党员教育不够才造成了一些党员变质“蜕化”的现象。

在现实生活中,某些部门单位的新入党积极分子有太随意化和平庸化倾向。对纳新对象,存在“拉扯关系”入党和用钞票换当票现象,有的党员内查外调居然叫他自己去进行,还有对其群众评议和考察意见

有流于形式做法。还有一些党员,在入党之初,就动机不纯,怀着为自己谋福利的心态混入了党员队伍。

此外,就是党员的民主生活会以及对党员的学习教育活动很少开展。特别是那些处于基层一线的党员以及流动党员,一年到头举行不了一次活动,加之本身的抗腐能力很差,思想不蜕化才怪。

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是一面旗帜,在扶贫救困方面、经济建设方面、文明风貌方面,都应体现党员的先进性和模范性。崇尚科学、求真务实的党员精神得到充分发扬,像“薛半仙”这样的党员才会彻底绝迹。

## 晚报观点

# 慈善缺的不是热情,而是信任

□张贵峰

21日发布的《2012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显示,2012年全国接收国内外社会各界款物捐赠总额约817亿元,占GDP的0.16%,人均捐款60.4元。较2011年下降3.31%,已是连续第二年下降。(《法制晚报》9月21日)

这样一组国内年度慈善捐赠数据,无疑既显得有些“难看”,也令人“难堪”。这不仅因为它是一组“连续两年下降”的数字,而且还是原本就非常低的基础上的“连续下降”。这正像媒体报道中指出的,“中国慈善捐赠规模与国际水平差距依旧悬殊”,“2012年美国接收社会捐款约为3162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中国GDP约为美国的1/2,但美国慈善捐赠

总量却是中国的近24倍”。

在“差距悬殊”背景下,我们的慈善捐赠何以依然“连续下降”?民政部官员提到的“持续负面影响”,显然是导致捐赠“连续下降”的重要原因。而这种所谓“负面影响”,实际上也即此前舆论曾热议的由于慈善组织公信力严重不足而引发的社会信任危机,如其中堪称典型的红十字会信任危机。而上述《报告》数据也已充分见证了这一点。如2012年红会接收社会捐赠约21.88亿元,同比再次减少了23.68%。而在2011年,红会接收捐赠28.67亿元,降幅近六成。

这种信任危机,归根到底还是一种社会公众对目前许多慈善组织的运行管理机制体制,难以形成信任的体制化危机。这正像原民政部部长徐永光曾提到的,“世界银行前行长曾告诉我,华人的慈善捐款热情很高。中国人现在的捐款数量没有想象的那么多,并不是文化的原因,而

是制度的原因。中国人有乐善好施、扶贫济困的传统,而现在的体制抑制了这种热情”。

具体而言,这种抑制慈善热情的体制,实际上也就是我们在许多半官方慈善组织身上都能强烈感受到的,那种具有浓厚“政事不分、政社不分”色彩、高度行政化权力化的慈善组织运行管理体制。诚如社科院《民间组织报告蓝皮书2013》指出的,“以红十字会为代表的中国很多官办公益慈善组织和社团组织具有强烈的行政色彩”,“官办社团组织频频遭遇严重信任危机,充分表明对他们的去行政化改革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这种背景下,要想改变所谓的“负面影响”,进而救赎“慈善捐赠连续下降”趋势,根本还在于必须彻底从体制上改变祛除慈善组织自身固有种种“负面”现状,如信息“不透明”,运行管理体制“行政色彩强烈”的“负面”现状。